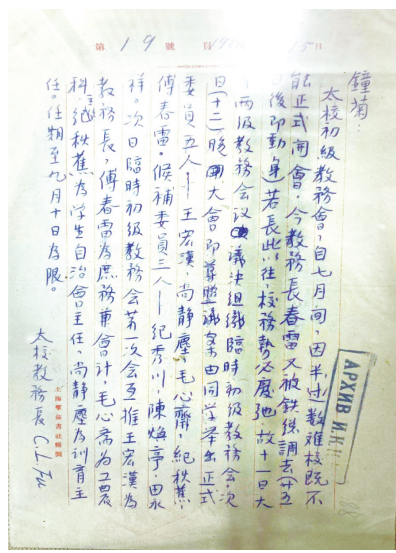


红色收藏

一封密信见精神



彭真写给团中央的一封信(彭真生平暨中共太原支部旧址纪念馆藏)

1925年8月,彭真化名傅春雷写信给团中央一封信,主要内容是汇报太原团地委改选情况。为了保密起见,信中多次使用暗语。原文如下:

大校初级教委会,自七月间,因半过数离校,既不能正式开会,令教务长春雷又被铁总调去(廿五日后即动身),若长此以往,教务势必废弛,故十一日大中两级教会议决组织临时初级教委会,次日(十二)晚,大会即遵照议案,由同学举出正式委员五人——王宏汉,尚静尘,毛心斋,纪秋蕉,傅春雷。候补委员三人——纪秀川,陈煥亭,田永祥。次日临时初级教委会第一次会互推王宏汉为教务长,傅春雷为庶务兼会计,毛心斋为工农科主任,纪秋蕉为学生自治会主任,尚静尘为训育主任。任期至九月十日为止。

大校教务长 C.L.Fu

1925年,阎锡山当局大量扩军,为了筹集巨额军费,不顾人民死活,大大加重了税赋。其中一项重税叫房屋估价税,即对全省城乡所有的房产(包括牲口棚、猪羊圈和厕所)逐户登记估价,按所估价“值百抽九”征税,并于1925年初下令各县开征。

5月18日,彭真、纪廷梓和潘恩溥等共产党员率领4000余名各校学生,一路高喊要求取消房屋估价税的口号,向督军府进发,沿途许多工人、店员、市民陆续加入游行示威队伍中,到督军府时已达万人。阎锡山自知支持征收房产税的人不多,怕事态闹大难以收拾,同意接见请愿代表。彭真、潘恩溥等20余名代表到督军府内同阎锡山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最终,阎锡山不得不答应立即取消房产税,并亲自写下:“房屋估价补契办法,着即取消,关于此项税款,如有收起者,立即退还,以昭公允。”

反房税斗争的彻底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省人民的革命斗志。同年5月,上海爆发了五卅惨案,彭真等共产党员领导山西广大民众掀起声援上海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斗争。

阎锡山取消房产税的三个多月来,一直怀恨在心,开始收集彭真领导革命斗争的材料,并准备发出通缉令,逮捕彭真。中共北京区委从多个渠道获悉这一消息后,决定迅速将彭真调离山西,到石家庄工作。这封信正是彭真在调离太原前所写,从中体现出革命者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

彭真生平暨中共太原支部旧址纪念馆供稿

瓷枕消暑

慧亭



金代三彩剔刻填黑“羊驮驮马”图枕(山西博物院藏)

初伏将至,太原进入盛夏后,气温逐渐攀升。古人在没有空调的夏天如何消暑?清人曰:“昔尚瓷枕,暑月用之必佳。”

山西博物院有一件金代三彩剔刻填黑“羊驮驮马”图枕,不同于普通瓷枕,它的枕身呈六角形,曾收录于《磁枕玄珠》。

这种六角形瓷枕是将长方形瓷枕的后端两角切去制成,两面高,中间略低,微有坡度。此种形制的瓷枕目前国内发现数量不多,且大多以黑釉作底。而山西博物院的这件瓷枕,枕身周围施绿釉且通体雕花,枕面为黑地勾金边“羊驮驮马”图。

瓷枕的历史,可追溯至隋朝。开始时,作为陪葬的明器居多。至唐代,瓷枕大多体积较小且较高,已开始流行。由于当时的烧瓷技术不算发达,瓷枕还比较稀有。到了宋朝,制瓷技术日渐成熟,瓷枕的种类开始增多,且做工也更加精致。

据记载,瓷枕心肤宜人,爽身怡神,是消暑的理想寝具,在宋代最为流行。有一些设计精美的瓷枕,还可以往里面灌入冷水、放入冰块,消暑的效果就更好了。

北宋抗金名将李纲在《吴亲寄瓷枕香炉颇佳以诗答之瓷枕》一诗中写道:“远投瓦枕比琼瑜,方暑清凉惬意肤……枕上片时聊适志,黄粱未熟到东吴。”北宋诗人张耒在《谢黄师是惠碧瓷枕》一诗中写道:“人作枕坚且青,故人赠我清凉蒸。持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惊。”这两首诗,表明了古人对瓷枕清凉消暑、助人入眠之功效的认可。

在中医学理论中,人的后脑处有一个重要的穴位称玉枕穴。长期使用温润清凉的瓷枕,可以刺激玉枕穴,起到疏通大脑经络的作用。《本草纲目》中记载:“久枕瓷枕,可清心明目,至老可读细书”,就是说常枕瓷枕可以保护视力,延缓视力衰退。

2024年6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太原市一座唐代“树下人物图”壁画墓的详细考古信息。该墓于2018年在太原市西中环南延工程旧晋祠路改造路段被发现。此墓葬为斜坡墓道单室砖室墓,墓门、甬道及墓室四壁、墓顶、棺床均绘有壁画。这座唐代壁画墓是目前太原地区有纪年的唐代“树下人物图”壁画墓中最晚的一座,对研究太原地区唐代“树下人物图”的流行时间具有重要意义。

太原地区唐墓“树下人物图”发现早、数量多,且内容难以识读,因而引起研究者极大关注,有学者称之为“太原模式”。

“树下人物”到底是谁?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晋阳古城研究所所长龙真,有他自己的看法。

——编者

古人事死如生事,因而陵墓的建筑和随葬品均仿照世间,犹如生时,此乃历代之流俗。因地域不同,墓葬涉及的文化内涵也不尽相同。西安和太原是出土唐墓“树下人物图”最集中的两个地区,但两地的图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太原地区唐墓“树下人物图”发现早、数量多,且内容难以识读,因而引起研究者极大关注,有学者称之为“太原模式”。众多学者各显所长,观点众多,迄无定论。

目前,太原地区已经出土的唐代壁画墓有20余座,全部带有“树下人物图”。其中,保存较好、资料较为完整的有17座;有确切纪年的6座,分别是赵澄墓(696)、郭行墓(700)、赫连山墓(727)、赫连简墓(727)、温神智墓(730)和乱石滩口(缺字——编者注)范墓(736)。另有龙山火葬场唐墓,由于墓志(砖质)文字漫漶,依稀可辨是唐开元年间。纪年墓以唐开元年间最多,没有纪年的墓葬,发掘者也大多将年代推定在初唐至中唐。

近年来,太原地区出土了一批绘画水平较高且保存较好的“树下人物图”唐墓,为这一题材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笔者认为,在太原地区唐墓中普遍存在的屏风画“树下人物图”,其中的人物应为墓主人。

有学者认为,屏风画“树下人物图”仅作为棺床上的一种装饰,内容为高士图、孝子图,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与道家修炼有关。但笔者以为,“树下人物图”有可能是将墓主形象代入人们熟悉的典故中以宣扬墓主道德高尚,类似于角色扮演性质。这样做的好处是,在有限的空间内不需要任何歌功颂德的言辞就可以把墓主人的德行表达得淋漓尽致,正如墓志铭中的“溢美之辞”。我们可以将“树下人物图”理解为“溢美之图”,其与高士图、孝子图之说并不冲突,可以理解为墓主

“树下人物”的“太原模式”

龙真



乱石滩唐墓墓室全景



“树下人物图”之一



“树下人物图”之二

之德堪比某孝子,胜似某高士。

屏风画“树下人物图”位于整个墓室的主位,是墓葬壁画中最核心的部分,而这一位置通常为墓主画像之所在。墓室中出现墓主画像自古有之,也是历代较为流行的题材,此点无需赘述。但为何到了唐代,墓主画像这一题材“不再流行”?纵观历史,也仅仅是唐代“不流行”,这一现象值得思考。

《宣和画谱》记:“画明皇者,不知仪范伟丽,有非常之表,但止于秀目长须之态而已,又恐览者不能辨,则制衣服冠巾以别之。此众人所能者,不足道也。”“恐览者不能辨”是画师的心态,“制衣服冠巾以别之”则是画师常用的手法,也是众人之所能。再看太原地区“树下人物图”中的人物,服饰、样貌都基本一致,大有画师恐览者误辨而“制衣服冠巾以别之”的意味。所以每套屏风画中所绘人物很可能是同一个人,墓主人的可能性最大。再看南朝模印砖壁画“竹林七贤与荣启

Advertisement for the 'Wei Stele Source' exhibition. It features a large calligraphic image of a stele inscription and text describing the exhibition's focus on Northern Wei stele art. The text includes: '魏碑溯源——平城时期魏碑书法艺术展'正在太原市博物馆展出,这是我国近年来首次举办的以北魏平城时期碑刻书法艺术为主题的大型展览,也是全国第十三届书法篆刻展山西展区的古代系列展之一。本展撷其精华,以饕餮者。——编者

魏碑撷珍

张永强

南北朝时期的“北碑”与“南帖”是中国古代书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别以铭刻雄强和笔札风流著称。清代康有为在其名著《广艺舟双楫》中推崇“魏碑十美”为:“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越、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他所指的是以魏碑书法艺术成熟时期的《龙门二十品》《云峰刻石》和《北邙墓志》为代表的洛阳魏碑而言。平城魏碑气势雄强,有阳刚之美;风貌朴拙,蕴高古之风。在时间、地域和艺术形态上与洛阳魏碑具有衔接性,“北碑”因有了平城魏碑而更为完整。

文成帝南巡之颂碑

北魏和平二年(461)刻,著录最早见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滹水》,后湮没无闻。20世纪80年代重新发现于山西省灵丘县郊唐河河谷台地,现移藏至大同灵丘觉山寺。

碑已断碎,下端佚失,龟座仍存。两面刻,篆额“皇帝南巡之颂”3行6字,碑阴刻从官题名2000余字,其体量是目前发现的魏碑中最大的。碑文记述了和平二年(461)三月,文成帝率军自平城出发,经定州至于鄚都(今河北省临漳县),途经此地举行上巳修禊和御射的活动,可与《魏书》记载相印证。

此碑的书体斜画宽结,笔势舒展、劲健,收笔上扬,仍有隶书的遗韵,整体书风已是较为成熟的楷书面貌,是北魏平城时代最重要的碑刻之一。

邑师法宗等五十四人云冈造像记

北魏太和七年(483)刻,1919年发现于云冈石窟第11窟东壁上层。

此记是云冈石窟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造像题记,也是现存北魏平城时代的重要石刻之一。内容为邑师法宗等信士女五十四人为孝文帝及其祖母文明太后“敬造石庙形像九十五区及诸菩萨”,是云冈石窟第11窟开凿的明确记载。

书体在隶楷渐变之间,笔致茂密,敦厚古雅,是平城魏碑雄悍书风的代表作。此拓为刚发现不久时民国梁上椿旧藏精拓本,钤“不风斋”“梁上椿印”。

孙恪墓志

北魏正平元年(451)刻,20世纪末出土于山西大同市市郊,大同市博物馆藏。

楷法绵密,隶意犹存,体势飞扬,笔力雄健,是北魏平城时代的典型书风。此为该志初出土时殷宪先生手拓,墓志时间据其所考。

华北金蟾

孜卜

被称为“华北金蟾”的“狗头金”是山西地质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因其外形酷似蟾蜍而得名。金是一种重要的贵金属,在地壳中含量极低,以单质集合体出现更是十分罕见,俗称“狗头金”。

“华北金蟾”产于大同市灵丘县料眼金矿,重达425克,纯度可达90%以上,是山西省有史记载以来发现并保存下来最大的一块。它是岩石中的金经过剥蚀、搬运,并在地表流体等综合地质作用下,最终在金矿下游河滩沙砾石层中沉积、聚集而成。



自然金“华北金蟾”(山西地质博物馆藏)



青铜编钟(山西青铜博物馆藏)

在山西青铜博物馆,藏有一组19件青铜编钟和一套13枚的石磬。它们均出土于春秋大墓——赵卿墓。

这套青铜编钟,形制相同,尺寸大小依次递减。比出土于湖北随州著名的战国曾侯乙编钟要早100多年。

《仪礼·大射仪》注:“钟如钟而大,奏乐以鼓为节。”《说文》:“钟,大钟,淳于之属,所以应钟磬也。”钟是春秋晚期出现的一种大型打击乐器,形制与钲钟相同,但体型颇大,是指演奏乐节奏的重要乐器,俯仰如合瓦的椭圆状,钲作带角张翅的飞虎状,銜梁对峙,鼓、舞、篆部或饰夔龙、夔凤,或饰散纹。这套编钟中最小的19号钟通高11.3厘米,仅重0.69公斤。

与钟相配的是石磬。磬一套13枚,多为灰白色石灰岩制成,形制相近,大小相次。除个别磬大致完整外,余皆破碎,并伴有严重的溶蚀现象。但据说敲击还能发出清脆的乐声。

磬是中国古老的打击乐器,为“八音”中的“磬石”音。由石或玉制成,钻孔悬挂于架下,击打发出声音。由于磬在祭祀活动中地位突出,统治阶级也逐渐加入这一乐器的研制中,并将其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由于备受历代帝王的青睐,加快了石磬艺术的发展,逐渐出现了编磬。

古代王公贵族的祭祀、宴飨等活动往往在敲钟击磬的美妙音乐中进行,称为钟鸣鼎食,排场十分豪奢。《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说明周人将祭祀和战争视为国家最重要的事情。祭祀与礼乐密不可分,祭祀文化逐步发展成为礼乐文化,乐与礼同样重要。在古代礼乐的作用,对贵族阶层主要用于祭祀、宴飨、典礼等,所谓助礼仪、祭鬼神;对平民阶层主要是教化民众、引领风俗。

赵卿墓出土的一组19件编钟是我国目前仅有的一套,既是研究音乐史的宝贵资料,又是工艺研究的典型实物。看到它们,人们仿佛置身于2000多年前的音乐殿堂,钟磬齐鸣,衣带飘逸,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石磬(山西青铜博物馆藏)

钟磬齐鸣在春秋

郭婷